

运/河/物/语

漕运厅事今何在

■张明明

《淮安运河文化志》载有明金铣《重修清江浦漕运厅事记》。金铣,字宗润,号省庵,山阳人。明正统举人,历官蕲州知州、广信知府、礼部员外郎。有《省庵集》留世,曾参修成化《淮安府志》。

《重修清江浦漕运厅事记》载,明正德年间,平江伯陈瑄曾在清江浦修建漕运厅事,后毁。40年后,明成化年间,其曾孙平江伯陈锐重修,并嘱金铣记之。

所谓漕运厅事,即处理漕运事务的办公场所。我们知道,明清的漕运总督府在淮安郡城山阳县即今淮安市淮安区境内,而清江浦竟然还有一个漕运厅事,这引起了极大兴趣,很想弄清它的位置今在何处。这样的念想好像不难实现,因为这篇文章记得好像很清楚:

乃卜淮阴之地,惟清江浦宜为仓百区……于仓之北沿河之滨,立南京及中都、江北各卫船厂。又奏立清江提举司,收受各郡所输船料,岁造转漕轴舳,设提举一人以司之,冬官主事一人以监之。仓之西北建灵慈宫,为祝禧之所。宫之旁稍西为此厅事,

便于总制也。

是吧?清江浦沿河南岸有船厂,船厂之南有大片粮仓,仓之西北建有灵慈宫,漕运厅事就在灵慈宫稍西的地方。循着这样的线索应该能确定漕运厅事的所在位置。但是,“清江浦”是一条线,“仓百区”乃一大片,“仓之西北”为大致方向,“宫之旁稍西”亦不知究竟多远,这些说得都很模糊,并不精确。想要依据这些信息确定一个点,确乎难矣。

我又在想,如果能找到灵慈宫,那么确定漕运厅事的位置可能容易些。恰好读到《漕运通志·卷之十·漕文略》(明·杨宏、谢纯编)杨士奇撰《敕赐灵慈宫碑记》,其文曰:

遂作祠于淮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盖公素所持敬者。凡淮人及四方公私之人有祈于祠下,亦皆响应。守臣以闻,赐祠额曰“灵慈宫”,命有司岁有春秋祭祀。于是董漕运参将都指挥金事汤公节请书饗之石。

由此可知,灵慈宫确实曾经存在,是为祀天妃之神而建的,有守臣祠额,有汤公饗石。然而这

也只能证明其曾有而已,灵慈宫的具体位置杨士奇没有具体说明,那祠额,那石刻,更不知湮灭多久,散落何处。灵慈宫在哪?亦无法确定。

能否从其他淮安历史文献中得到答案呢?本人翻阅了相关的几种志书,还是没有找到关于漕运厅事位置的信息。其实,即使从中找到蛛丝马迹,几百年来,清江浦地形地貌因水患战乱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想找到漕运厅事的位置也是很难的。

漕运厅事,也许永远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透过《重修清江漕运厅事记》,我们除了看到陈瑄对漕运、对淮安作出的历史功勋,更会感念他的精神。

陈瑄作为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他的办公地点当然应该在建于府城的漕运总督府。但是他却在当时算不上繁华的清江浦择地建厅事,且经常居住这里办公。为何?

《重修清江浦漕运厅事记》记载:

宣德改元,敕公镇守淮安总漕如故。公虽开府郡城,往来恒

居厅事,盖恐料量之不平,出纳之不经,制作之无度,财用之侵费,百尔工役旷日废事,无以称塞德意也。

其时,清江浦在进行多项漕运工程建设,这些工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漕运事业的成败,这不能不让陈瑄夙夜忧叹。他在担心:工程所需钱粮等算得是否公平准确?各项经费支出是否合理?诸多制造是否适度?财物是否有贪污浪费?从事工程人员是否拖延时日积压事务?这些都是他这个漕运总督的责任所在,其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可以想见。为此,他干脆到清江浦建厅事,经常离开漕运总督府,亲自督战,靠前指挥。陈瑄能够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名臣,固然有很多条件,但是他的这种勤勉、认真、细密、不懈,无疑也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漕运厅事无处觅,但它留下的精神价值将永远闪耀着历史的光辉。



今日横跨文渠河的石桥和石桥路



地/理/变/迁

清江浦石桥街今昔

■黄迎红 文/图

石桥街是个老地名,在清江浦闸口境内,原处轮埠路中部。很早就听外公(生于1908年)说过:石桥街,1949年前是一个比较热闹、生活气息和商业味均浓的地方。老家门前那一条从西到东、到了糖果厂围墙就断头的半截路,就是当年石桥街的其中一段。石桥街曾是一条三四里长的长街,东到油库(今清隆桥)西至禽兔厂东(今越秀桥东),与桥南街(禽兔厂身底以西,老城隍庙街遗址)、厂前街(日化厂到老粮店)相连,紧挨着里运河南堤,都是运河漕运兴起的古老街道。明清时,这一带以米行居多。石桥街名,缘于里运河东南(原罐头厂大门北)一座几块石板铺成桥面的石桥(文渠沟东起源)而得名,从古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第一任街长叫阮金荣。

随着漕运改海运,运河两岸繁盛的米行生意一落千丈,石桥街也变得冷清了下来。失去了大市场与郊区接壤的石桥人,为了糊口,便做起了单一的小买卖:油条、辣汤、面条、煎饼、磨坊、粮店、茶炉灶等;外公开办的日杂百货店算是大生意。大部分人家并不富裕,住的只有地基一截是砖的草屋。但那一望无际的街面上,街坊邻里从早到晚摆摊售卖,人来人往,生活的烟火气浓郁。民国时期,石桥便以“挑8根系子的”(即前后系4根绳子挑担子的)闻名清江浦,走街串巷吆喝卖辣汤、绿豆圆、豆腐脑、糖粥的,收废品和卖菜的,都是从石桥过来的。

靠祖传手艺养家的石桥人,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大都带着手艺进了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成了大饭店的打灶生意。如“丁老饭店”当年生意红火,就是孙老爹带去的祖传辣汤打出来的招牌。海带、干丝、面筋、粉丝四种食材,几十年经久不变。还有石桥饭店的“玉龙烧饼”,大闸口人一早跑来,一买就是一篮子,叉酥芝麻烧饼,层数多、有劲道、吃起来薄脆酥香,尤受食客欢迎。那时候想吃到他们的辣汤、烧饼,都得排队。我外公自然是进了清江市糖烟酒公司。由他负责经营的那一井国营糖烟酒百货店,就在老家南面二三里远的郊区,外公和另一年龄相仿的员工,到了退休年龄因没有人来接班,一直干到国有体制改革、糖烟酒公司民营化,80来岁了才“退休”。

石桥街,在1958年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迁。当年兴建工厂,从大闸口向东沿河岸老街,建起了日用化工厂、百货站仓库、肉联厂(后禽兔厂)、酱醋厂、糖果厂、石油二级站、内衣厂、造纸厂等。石桥街因工厂密集,街上大多人家被工厂占去,人员被安置到石桥新村、红旗新村和大路新村生活。一夜之间,这些人从糠箩跳进了米箩,全住上了砖墙瓦房。剩下的街道以糖果厂为界,分为石桥东街和石桥西街,我老家隔在糖果厂、酱醋厂之间,归为西街。原来坑洼不平、泥泞的那条河堤路(轮埠路),随后被平整扩建成五六米宽的石子路。前所未有的景气,也让运河两岸的居民看到了商机,仅石桥一段的运河上就催生四个摆渡,中间两个是石桥人经营的,他们为两岸的上班族撑起了一条水上便利之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清隆桥的建起,摆渡才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乡/土/杂/记

因高家堰水灾而起的《儿女英雄传》

■朱爱民

明清时期,因黄河夺淮,二水交汇于淮阴,黄河经常泛滥,淮河经常淤积,给富饶的江淮、黄淮平原带来灾难,水天泽国,民不聊生。而运河又要在淮阴借道原来的淮河与泗水河床运行,把南方粮食等物资运往北京等地。因此,明清二朝,为了民生和国运,治河、理淮、济运成为国家战略,淮阴成为水利重地,即今天称之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清口枢纽”。

“束水攻沙”“蓄清刷黄”,为了蓄水把大堤加高,洪泽湖因此而形成。洪泽湖大堤的原名叫“高加堰”,也就是说,高加堰不是地名,而是大坝的名字,从淮阴马头镇到盱眙张庄的大堤,叫高加堰。

文学、文艺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明清时期小说兴起,在许多小说中,都出现了淮阴、清江浦、淮安府等地名。其中有一部小说就是以高家堰发生的事件为引子,讲述了一段故事,这就是言情武侠小说《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故事说的是北京有一位汉军旗人旧家子弟安学海,到了五十岁上下才考上功名,本不想离开北京,但却被外放到清江浦的河运总督府来任职,于是安老爷就雇了一辆“南车”给夫人乘坐;另雇了一辆大车,给自己与家里的勤杂人员代步。所谓的南车,就是南方兴时的轿车,铺设讲究,乘坐舒服。据志书记载,当年淮阴王家营有轿车厂100多家,大车厂48

家,另外还有七八家骡厂,就是专门喂养骡子给行人骑乘,收取报酬。安老爷一家人旅途劳顿,终于到了王家营,过河到清江浦上任。由于安学海是书生性格,不懂社会,见上司时连见面礼都没带,就被分到邳县的一个工段。他不会拍马,不会行贿,更不会贪污、中饱私囊。连工料预算都省之又省,遭上司与同僚嫉恨。时间不长,就“因祸得福”,被调回清江浦,分配到高堰厅下面做一个小官(清朝在高加堰设“高堰厅”机构,六品衔)。谁知第二年桃汛,高加堰外河出现决口。于是上司按渎职罪将他法办。消息传到北京家里,儿子安骥立刻动身来淮安府救人。路上遇到侠女十三妹等一众绿林

好汉的相助,来到清江浦,救出父亲。

在小说中,故事的重点是安公子在路上的遭遇和奇缘,但故事的起因发生在高家堰,且是因治水而起,还出现机构名“高堰”等名词,这是关键。

《儿女英雄传》影响很大,1986年拍成电影《侠女十三妹》,许多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都看过。1999年香港拍成40集《儿女英雄传》电视连续剧。新中国成立后,女作家袁静写了一部小说,名字叫《新儿女英雄传》。从今天的运河文化来说,这部小说是运河的文化衍生品,是高家堰在文学上精彩之处。

口/述/历/史

从报恩寺到肖嘴小学

易少敏

盱眙县鲍集镇小南庄周边地区十里八乡耄耋之年的老人,大都知道,村庄西边二里左右的高岭上,曾有一座闻名遐迩、规模宏大的古寺——报恩寺。从寺名,可约略知道它的含义和建者的意图。后来,我知晓是大明王朝开朝皇帝朱元璋为报恩一名村妇而修建的:战乱中,村妇为哺乳婴儿的朱元璋而献出年轻生命。我的祖父曾见过那灰

砖小瓦、古香古色、金碧辉煌的寺院:一个院落,前后两排较大的房舍,两侧的小屋为辅助用房,总体布局类似于北方的四合院;20多间房屋,正殿在后排正中,坐北朝南,位于高岭处,十分显眼,十里远都看得见。鼎盛时期,方圆百里数十个村落的黎民百姓、达官贵人都在这里敬香供奉、顶礼膜拜、祈福平安,寺院里整天香烟缭绕、钟声悠扬,一派

热闹景象,如集市一般。

由于旧时淮河逢大雨必遭水灾,水患不断,寺院虽在高岭,但周围地势低洼,又较为偏僻,为便于人们常年祈祷敬佛,所以在清朝中后期,报恩寺便迁移至我老家小南庄后面约一里路远的一个叫张岗的村庄上,建有主屋五间,供奉佛像。1946年起,寺院兼为村委会会议室,但烧香敬佛没有终止,香火一直延续至

1949年。后来,庙里的僧人出走,寺庙荒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经过两三年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家乡社会治安逐渐稳定,社会秩序好转,百姓安居乐业,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一些村民子女开始上学读书,这座荒废的寺庙被改建成小学——唐庄小学(现名肖嘴小学),笔者小学阶段就读于该校。